

“中西文化交流”之意义及其个案研究 ——以金岳霖为例

崔治忠

(上海师范大学, 上海 200234)

摘要:在学术界越来越重视中西文化交流的当下,有必要澄清“中西文化交流”概念的意义、所指及其相互关系。作为一个组合概念,“中西文化交流”的意义与所指具有宽泛性和历史性,这就要求在具体研究时,既要进行概念层面的意义分析,又要与具体所指对象的研究结合起来。唯有如此,才能理清哪些历史事件是真正的中西文化交流活动,哪些不是。从而不再把西方文化单方面的输入与中华文化单方面的输出视为中西文化交流。但是,为了澄清“中西文化交流”的意义和所指,就有必要把对概念的理解与具体的个案研究结合起来。

关键词:中西文化;交流;意义;所指

中图分类号: B 815.3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8-7192(2013)02-0001-07

The Significance of “Chinese and Western Cultural Exchange” ——A case study of Jin Yuelin

CUI Zhi-zhong

(Shanghai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234, China)

Abstract: Given that more and more attention at present is paid to the exchange between Chinese culture and Western culture, it is necessary to re-define the concept, the referent and the relationship of “Chinese and Western cultural exchange”. As a combined concept, its meaning and referent are broad and historical. So analyzing the meaning conceptually and investigating the referent concretely is indispensable to clarify which historical events are real cultural exchange activities between, and distinguish the unilateral input of either Western culture or Chinese one from a cultural exchange. Therefore the clarification of the meaning and referent of “Chinese and Western cultural exchange” involves the conceptual understanding and the case study as a whole.

Key words: Chinese culture and Western culture; exchange; meaning; referent

近年来,学界对发生在我国历史上,尤其是明末清初以来的中西文化交流活动给予了越来越多的关注。但是,在具体研究这些活动之前,需要对一些基础性的问题进行思考和回答。例

收稿日期:2012-11-05

作者简介:崔治忠(1979-),男,甘肃临洮人,上海师范大学哲学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哲学。

如,什么是“中西文化交流”,哪些事件是“中西文化交流”的所指对象?然而,不同的学者对这些问题给出了不同的回答,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这就导致学术界对一些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的解读出现较大分歧,甚至出现截然相反的评论。需要指出的是,许多学者将西学单方面的传入视为一种中西文化交流活动,甚至把中国文化被西方人带入西方的过程也称作中西文化交流。显然这样的界定是不准确的,甚至是一种夸夸其谈的文化自欺。为了避免这些认识方面的错误和研究方面的失真,就有必要澄清“中西文化交流”概念的意义及其所指。但学理层面的分析总有一种与现实相隔离的问题,为了尽量弥合两者之间的隔离,笔者以金岳霖积极参与“西学东渐”活动为个案,分析在具体研究当中,如何有效地将概念的意义与所指结合起来。同时,也以个案为例来说明不能将西学东渐视为一种中西文化交流活动。

一、澄清“中西文化交流”概念的意义及所指

“中西文化交流”是一个组合概念,它由三个简单的语词组合而成,即“中西”、“文化”和“交流”。与“中西文化交流”一样,这三个语词在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具有的意义也是不断衍变的。比如,“中西文化交流”中的“中西”是一个表征方位的词,对不同地理位置和历史时期的认识主体来说,它的意义和所指就很不相同。具体来说,对清代以前的绝大多数中国人而言,“西方”是一个非常模糊的概念。受佛教传入的影响,西方被认为是中亚及南亚次大陆地区,即历史上的泛印度地区。直到两次鸦片战争之后,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开始将欧洲和北美洲作为指称对象归于“西方”这个概念。但在当今社会,我们主流观念中的西方就单指欧美发达国家和地区,有时候连带指称日本。相比于“西方”,“东方”是相对于欧洲来讲的,早期欧洲人的“东方”概念主要指距离西欧较近的近东地区,即巴尔干半岛和小亚细亚地区。到了近代,他们才开始关注更远的东方,即

中东和远东地区。“西学东渐”中的“东方”特指处于远东地区的中国,显然,这与“中西文化交流”中的“中”的所指是一样的。

对于“文化”概念意义的理解,因受宗教信仰、语言文字、生活方式、风俗习惯以及地理环境等因素的制约,就显得更为复杂和困难。因此,关于“文化”的定义也就非常多,有学者通过研究发现各式各样的“文化”定义达200多种,仅《大英百科全书》就收录了166条,这些定义分别是由世界著名的人类学家、哲学家、政治学家、社会学家以及心理学家给出的^[1]。但是,笔者无意通过综合各种不同观点来寻求统一的定义,之所以如此有两个原因:一是因为这样的工作许多学者都已经做过了,一是因为统一的定义很难得到,即使得到了,它的价值也不是很大。为此,笔者通过直接界定的方式赋予“文化”以具体意义,即文化是指一个国家或民族的历史、传统习俗、风土人情、生活方式、行为规范、文学艺术、宗教道德、思维方式以及价值观念等。当然,不同的学者可以赋予其不同的意义,但必须要满足一个条件,这就是所给出的定义与包含该“文化”定义的意义系统相融洽。至于“交流”,就字面意思来讲是两个及以上主体之间就某某对象开展交换、探讨或论辩。由此可知,交流活动得以开展应具备三个必要条件:即不同的交流主体、确定的时间和地点以及可供交流的对象。由于交流的主体和地点具有更替性,时间具有历时性和共时性,交流对象的具体所指具有宽泛性,这就导致具体的交流活动是极其丰富和多样的。

最后,将“中西”、“文化”以及“交流”这三个简单语词组合起来就可以形成“中西文化交流”概念,其具体意义可以近似地描述为:在某时间和某某地点,中国人与西方人就表征各自文化的东西或对象进行探讨或交换。需要说明的是,文化交流的时间可长可短,地点可以在中国,可以在西方,也可以在其它地区,但文化交流必须在中国人和西方人之间进行。那么,没有中国人参与的所谓的“中西文化交流”是不是真正的中西文化交流呢?也许在一些学者看来答案是肯

定的,但笔者认为既然没有中国人参与,那谁来代表中华文化呢?没有中国人参与的中西文化交流又能给中华文化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相反,在笔者看来,只有中国人最能代表中华文化,因此,没有中国人参与的“中西文化交流”活动根本就不是真正的中华文化与西方文化之间的交流,充其量是外国人就他们所认识的中华文化与西方文化展开的交流。

如前所述,“中西文化交流”的意义因受诸多变项的影响而变得极其丰富,这就决定了“中西文化交流”概念的所指对象异常庞杂。但从现实层面来讲,传统中国是一个以农耕生产方式为主的国度。相对来说,自身国土面积广袤、物产资源比较丰富,再加上周边的异质文化不发达,这就产生了两种现象:一是中国内部的物质与文化生产基本能够满足社会的需求,一是中国与外部世界之间的主动的物质和文化交流活动比较贫乏。单就为数不多且规模不大的文化交流活动而言,它们也主要局限在中原王朝与周边国家及民族之间。需要注意的是,虽然这种小规模的文化交流活动从汉朝开始并延续至清末民初,但由于区域文化的同质性、交往的民间性使得这样的文化交往并没有对中华文化的核心理念产生过重大的影响。但是,有两次交往活动除外。

一次是印度佛教的传入。自东汉之后,佛教逐步从西域传入我国^①,并在佛经的翻译与佛教思想的传播过程中与本土文化,尤其是儒学和道家思想相互激荡与融合,在很大程度上重塑了隋唐之后的中华文化。此外,在佛教传入的同时,逐渐本土化的佛教与儒家、道家思想以或者融合或者并立的方式传入朝鲜半岛、日本及越南地区,这样的文化输出从隋唐一直持续到明末清初。至于明末清初传教士输入西方思想的文化交流活动,虽然学界近来比较关注。但笔者认为由于规模不大,参与主体仅涉及少数知识精英、官僚和传教士,交流内容又主要限于自然科学知识(如数学、天文学、地理等)和天主教思想,这样

的传授内容或者比较难懂或者与本土文化不相符合,从而导致这次西方文化在中国的传播范围极其有限、影响也非常微弱。因此,它很难算作中西文化交流的一个高潮。

另一次是从清末民初开启的“西学东渐”。“西学东渐”是中西综合实力较量的必然结果,尽管许多学者将其归为中西文化交流活动,但实际上这是一次西学单方面的输入。就参与的主体而言,在西学传入的早期,由于语言不通,主要依靠部分传教士,除此之外,基本上都是懂外文(主要是日文或英文)的中国人。此后,引入西学的主体成为清末民初通过公费或自费方式出去的大批留学生。就引入的内容而言,几乎包含了从哲学到农学以及军事学在内的所有学科内容,并经历了从自然科学到人文科学,从重点引入到全面引入的转变过程。需要强调的是,此次“西学东渐”一直延续到现在,并将继续开展下去。可以肯定地说,它对中华文化的影响将是结构性和本质性的。

总之,从历朝历代与国外的交往来看,文化方面既有单方面的输入也有双方的互动交流。但相比较而言,单方面的输入或输出比较多,双方或多方之间的互动就少的可怜。例如,就佛教的输入和西学东渐而言,东方是单方面的引入,基本上是有来而无往。就儒学和佛教的东传与南传来说,朝鲜、越南和日本相对来说更为主动。但是,按照本文对“中西文化交流”概念的解释,佛教的传入、明末清初西学的传入以及清末民初的西学东渐都不是严格意义上的中西文化交流活动,因为不管这里的“西”指的是泛印度地区还是欧美国家,作为中西文化交流主角之一的中华文化并没有做出积极的展现和应对,更遑论对西方文化的影响了。那么,怎么看待这些文化交往活动呢?笔者认为它们都不是中西文化之间的相互交流,而是西方文化单方面传入中国或中华文化单方面传入东北亚和越南的活动。

^①佛教除从西域传入中国外,还从中国的西南地区传入。相比较而言,对前一传入路径学者们的研究已经非常深入,但后一传入路径直到最近才开始受到学术界的关注。

二、个案的研究——以金岳霖积极参与“西学东渐”活动为例

意义是所指的意义,并且指向具体对象;同时,只有通过具体所指,意义才能如漂浮的孤舟回归存在的港湾。“中西文化交流”的意义与所指亦是如此。其所指应是具体事件,即具体主体所从事的具体文化交流活动。拿近代以来的“西学东渐”来说,尽管我们可以运用大量的摹状词去描述它,但终究缺乏生动性和具体性。只有大量深入到具体的交流事件当中去,才能彰显“西学东渐”的意义。在此,笔者以清末民初留学生中的一员——金岳霖为个案,试图通过对其积极参与“西学东渐”活动的研究,分析“中西文化交流”概念所指对其意义的重要影响。

金岳霖(1895—1984)是中国当代著名的哲学家和逻辑学家。他毕生从事哲学和逻辑学的教学与研究,是最早把现代逻辑介绍到中国来的逻辑学家之一,也是20世纪少数几个建立完善哲学体系的哲学家之一。他在知识论、形而上学以及逻辑学领域做出了杰出贡献。其哲学代表作有《逻辑》、《论道》和《知识论》。此外,金岳霖也是清末民初出国留学大潮中的一员,他早年留学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学习政治学,1917年获得学士学位。同年,他转入哥伦比亚大学继续学习政治学,并依次获得政治学硕士和博士学位。毕业之后在美国呆了三年,1921年回国为母亲奔丧,年底他又去欧洲游学,一直呆到1925年12月他才回国。第二年秋天他接替赵元任在清华大学讲授逻辑学。自此之后,金岳霖就专职从事哲学和逻辑学的教学与研究。显然,这样的求学和工作经历正好说明他积极参与了西学东渐活动。

但就为西学东渐所做的具体事情而言,金岳霖主要做了以下两个方面的工作:一是编写逻辑学教材,培养逻辑学和哲学方面的人才。就编写教材而言,金岳霖单独和合作编写了《逻辑》、《逻辑通俗读本》以及《形式逻辑》等。这些教材成为影响几代学人的经典读本,尤其是《逻

辑》,它第一次将西方刚刚兴起的数理逻辑介绍到中国,为此后数理逻辑在中国的发展发挥了巨大作用。就培养人才而言,金岳霖的学生众多,主要分布在哲学和逻辑学两个领域。仅逻辑领域的学生就有很多,比较知名的有沈有鼎、王宪钧、殷海光、王浩等人。其中,王浩于1945年毕业于清华哲学研究所,次年去美国哈佛大学学习,师从著名美国哲学家蒯因(W. V. Quine),随后留校任教,后来成为世界著名的数理逻辑学家。

另一方面,金岳霖利用在西方所学的知识著书立说,这主要表现为《论道》和《知识论》两部著作的撰写。前者是金岳霖从形而上学和逻辑学的角度思考宇宙万物存在状态及其生灭变化的理论成果。该书于1940年被评为最佳学术著作二等奖。在金岳霖的众多著作中,《知识论》是他用力最多,出版最坎坷的一本书,也是他的知识论思想体现最集中的一本书。就其内容而言,《知识论》主要分析了知识形成过程的主要因素和环节、真命题的判定以及真的定义与标准。应该说,《知识论》一书深受休谟、康德、摩尔、罗素和维特根斯坦等哲学家的影响,但又体现了金岳霖对“知识底理”的独特理解。在中国哲学史中,它是第一部成体系且纯粹的知识论著作,不仅丰富了中国哲学的研究内容与对象,而且开启了此后学术界对知识论研究的大幕。

限于篇幅,上文粗略地介绍了金岳霖为西学东渐所做的具体工作。如果想要知道这方面的更多信息就需要研读更为专业的著作。此外,还有一个问题值得我们去追问,那就是金岳霖为何要参与近代的西学东渐活动?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时代背景的影响。近代以降,中国陷入亡国灭种的灾难之中。国家何去何从,民族能否复兴,很多有识之士和青年学子为之焦虑不已。而任何有希望之举都会使爱国之士激动不已。比如,1911年11月爆发辛亥革命,当时金岳霖在清华学堂读书,他以喜悦的心情迎接辛亥革命,积极响应革命口号,立即剪掉辫子并仿照唐朝诗人崔颢的《黄鹤楼》作一首打油诗:“辫子已

随前清去,此地空余和尚头。辫子一去不复返,此头千载光溜溜”^[2]。在这种强烈的爱国心驱使下,许多热血青年或官派或自费出国留学,寻求救国之道。金岳霖亦是如此。这一点也可以从他留学早期所学专业体现出来。1914年金岳霖在公费留学美国之前,就专业问题请教五哥(金岳初),五哥建议他学习簿计学。他到美国后进入宾夕法尼亚大学商业科,但始终提不起兴趣,后来改为政治学。在给五哥的信中,他说:“簿计者,小技耳,俺长长七尺之躯,何必学此雕虫之策。昔项羽之不学剑,盖剑乃一人敌,不足学”^{[3]400}。为此,他以政治学专业获得学士、硕士和博士学位。金岳霖之所以学习政治学多少与寻求国家富强有关。

其次是家庭和早期教育的影响。金岳霖出生在一个洋务派官员家庭。父亲金聘之是盛宣怀尚书的部属。而后者是中国近代民族工业和洋务运动的开拓者与积极参与者。金岳霖有六个哥哥和两个姐妹。其中,大哥岳祈为清末举人,二哥岳祐留学德国,三哥岳祁留学俄国,五哥留学日本。在这样一个受西方思想影响的家庭中成长,出国留学应是其自然选择。这一点在他后来的学习经历中得到印证。如1907年,12岁的金岳霖就进入长沙雅礼学校读书。而雅礼学校当时是由美国基督教会主办,学校的监督、教师和医生都是美国人,当然讲课皆用英语。中学毕业之后两次报考清华学堂。而清华学堂当时就是留美预备学校,金岳霖之所以两次报考就是准备出国留学的。由上可见,家庭和早期教育为金岳霖留学,乃至后来从事学术研究提供了条件。

再次是个人兴趣的引导。前面提到过金岳霖到美国后先学习商业学,由于始终提不起精神,而转学政治学。在研究政治思想史的时候,涉及到格林(Thomas Hill Green)的理论,使他“头一次感觉到理智上的欣赏”^[4],随后由政治学接触到哲学。但在1920年拿到博士学位之前他没有系统学习过哲学。在后来的欧洲游学当中,“有两本书对他的思想产生了‘特别大’的影响。一部是罗素的《Principles of Mathemat-

ics》,另一部是休谟的《Treatise》”^{[3]346}。正是由于休谟和罗素的影响,他彻底放弃了政治学而转向了哲学。至于后来对逻辑学产生兴趣他认为完全是出于偶然。金岳霖自己说,约是1924年的某一天,他和张奚若以及美国小姐泰丽莲在巴黎圣密歇大街上散步,遇见一群人在争吵,他们三人驻足而听,然后不自觉地加入辩论,他和张奚若竟然各支持辩论的一方。辩论中有逻辑问题,他由于不了解什么是逻辑,从而对其产生兴趣。由上可见,金岳霖之所以转向哲学和逻辑学不是外力使然,而是纯粹出于个人的兴趣。

最后是优良学术环境的促成。对于教学和研究活动而言,良好的学术环境非常重要,正是由于宽松和崇尚知识的学术环境才会使金岳霖可以从事自己热爱的哲学研究。比如20世纪上半期,中国尽管内忧外患,但学术思想非常自由,国内外学者之间的交流比较普遍,再加上教授的社会地位比较高,因此研究成果的大量出现也就不足为奇了。即使在抗战中后期,物质生活极端贫困,但大多数学者依然坚持著书立说并从事文化传播活动。最为津津乐道的当属西南联大了,她在极其艰苦的教学和生活条件下,竟然能培养出众多的杰出人才,而且,该校的教师和学者也创作出了许多精彩纷呈的理论作品,这不得不让人惊叹。例如,冯友兰的“贞元六书”和金岳霖的《知识论》就产生于那个时期。

总的来说,历史上各个时期的中西文化交流活动是各不相同的,这表现为:或者时代背景不同,或者传入的内容不同,或者中国人对其的态度不同。但通过对金岳霖积极参与近代“西学东渐”活动的个案分析之后,我们就可以模糊地知道近代“西学东渐”是在什么背景下开展的,什么样的人参与了此次活动,他们采取了什么样的态度,又做了些什么事情等。当然,要深入研究近代“西学东渐”的历史,仅仅分析单个的案例是不够的。应该说,只有随着对更多交流事件的深入研究,“西学东渐”的意义才会更加明晰。

三、“中西文化交流”之意义与所指的关系

语词的意义和所指密切联系,意义描述所指,所指体现意义。具体到“中西文化交流”概念,意义对所指的描述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意义将研究主体的意识活动导向所指对象。当研究者注意到某一事件涉及到“中西”、“文化”和“交流”中的任何一项意义时,他就意图分析这一事件是不是“中西文化交流”的一个所指。具体来说,他可以利用背景知识对表达这一事件的语句进行语义分析,领会其大概思想,然后将这种思想与“中西文化交流”的意义进行对比。如果有重叠,就对这一事件仔细分析,直到确定“中西文化交流”的意义蕴含该事件的思想,如此以来,就可断定其为“中西文化交流”概念的一个所指对象。否则,就应该排除出“中西文化交流”的所指范围。另一方面,意义对具体事件起总括作用。正如维特根斯坦所言,“世界是一切发生的事情。世界是事实的总体”^[5]。所有可能的事件构成了无限的世界,然而,个人的时间和精力毕竟有限,要想认识无限的世界,意识活动只能通过抽象活动归纳出诸多事件的共性来指称对象。作为世界很小一部分的中西文化交流活动亦是如此。尽管从理论上讲,这一类事件的总数是有限的,但是,相对于人的生命和精力来说,这些有限的事件也不是人们所能完全研究清楚的,或者说,人们不可能对所有的中西文化交流活动进行研究并得到确切了解。

就金岳霖参与近代西学东渐活动而言,虽然学者们将这次西学东渐视为中西文化交流的重大事件,但如前所述,笔者认为它仅仅是一场大规模的西学引入活动,根本谈不上中西方之间的文化交流。当然笔者并不否认在近代西学东渐的过程中有一定数量和规模的中西文化交流活动发生,但不能由此就把两者混杂起来,更不能把西学东渐视为中西文化交流。从本质上讲,这是明确“中西文化交流”概念意义的问题,但要澄清概念的意义,仅仅依靠语言分析还不够,还需

要深入到具体的所指当中去。这就涉及到意义与所指的相互关系。为了方便起见,笔者仍然以“西学东渐”概念为例进行说明。从概念的意义来看,“西学东渐”就是西方的学问逐渐进入东方,尤其是中国。这里涉及到两个关键点,一是西方的学问,一是进入中国。那么,我们为什么说金岳霖出国游学和回国讲学、著述是积极参与“西学东渐”的活动呢?其实,答案是非常明显的。

具体来说,金岳霖早年出国留学,起先学习的是西方的政治学,后来由于兴趣的转移,他开始关注哲学。当然,他所关注的是西方哲学,尤其是英国经验主义哲学。后来他在法国游学,路遇吵架,发现其中涉及逻辑学,由此对逻辑学产生兴趣。总的来说,金岳霖所学的都属于西学。回国以后,金岳霖最初短暂讲授过英文和英国史,随后就一直从事哲学和逻辑的教学与研究。尽管在《论道》中,金岳霖使用了大量的中国哲学术语,如,道、无极、太极、几、数、理、势、性、情、体、用等来建构其元学体系。但他试图融合中西哲学的做法并不成功。对此,贺麟评论到,“金先生以独创的且习于‘用英文想’的元学思想,而又多少采取了‘旧瓶装新酒’的办法,用了一些宋明理学的旧名词以表达之,往往增加理解的难度,而未必能达到他所预期的感情的满足”^{[6]278}。此外,《知识论》更是一本用中文写的西方知识论,其中几乎没有涉及到中国哲学中的认识论。可以说,金岳霖的哲学著述仍然以传播西学为主。总之,求学和工作两个方面的表现完全可以说明金岳霖积极参与了西学东渐活动。

以上是通过概念的意义来界定和评价历史事件。与此同时,概念的所指对意义具有澄清作用。“中西文化交流”的意义尽管可以通过尽可能多的摹状词来描述,但由于摹状词是抽象的,而所指是具体的。即使再丰富、全面的摹状词组也不能完全描述所指。况且,通常能够运用的摹状词是有限的。因而,我们只有通过大量所指对象,即诸多具体案例的研究才能明确“中西文化交流”的意义。就金岳霖参与“西学东渐”这个案例来说,要想知道“西学东渐”的具体意义,仅

仅靠字面的含义是无法确切知道的。如果想快速了解它的意义,一个可行的办法就是查询百科全书,阅读关于“西学东渐”的词条。应该说,通过这样的方法就能够对其意义得到总体把握。比如,我们由此就可以知道西学东渐发生在什么时候?是在什么样的背景下发生的?以及什么人参与了?等等。但是,这样的把握仍然是粗线条的,如果想要深入了解具体的人物为西学东渐中做了什么样的工作,那么就必须进行个案研究。

就上述个案来说,要想知道金岳霖为何出国以及为何不听从哥哥的建议学习会计学而学习政治学,又为什么从政治学转向哲学和逻辑学,以及他回国以后为什么要撰写《论道》和《知识论》等问题,就需要对金岳霖的成长、学习以及工作的具体情况作深入的了解和分析。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知道他是如何参与“西学东渐”的;也只有了解了诸如此类的个案,我们才能对“西学东渐”有更为具体和全面的理解。同样,对“中西文化交流”意义的理解亦是如此。

然而,概念的意义与所指之间存在着一种内在张力,这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方面,意义描

述所指就会导致挂一漏万的现象,或者说,它抓住了所指对象的共性却丢掉了对象具有的无限丰富性和差异性;另一方面,执着于具体所指似乎最接近于事实,但过分执着于具体的事实就有可能迷失于茫茫细节之中而不辨方向。那么,如何有效地化解这种紧张关系呢?应该说,唯一有效的办法就是加强概念的意义与所指之间的联系,协调意义的普遍性与所指的具体性之间的关系,使概念的意义在抽象性层面高于所指但又不脱离所指。同样,具体的所指必须要用含义清楚的概念来规范和区分,尽量避免能够用许多不同概念指称同一对象的情况出现。打个比方来说,概念的意义和所指就犹如望远镜的目镜(意义)和物镜(所指),只有目镜、物镜和观察对象处于一定的空间关系当中时,眼睛才能看到最清晰的事物。同样,只有把“中西文化交流”概念的意义和所指对象有机结合起来,我们才能更准确、更清楚地知道什么是中西文化交流,哪些历史事件属于中西文化交流;只有如此,我们才不会错把文化单方面的输入或输出视为文化交流活动;也只有如此,我们才会拥有通过中华文化的自我革新以便与西方文化展开对等交流的文化自觉。

参 考 文 献

- [1]郭莲.文化的定义与综述[J].中共中央党校学报,2002,6(1):115-118.
- [2]金鼎汉.缅怀我的叔父金岳霖教授[M]//中国社科院哲学所.金岳霖学术思想研究.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360.
- [3]胡军,王中江,诸葛殷同,等.金岳霖思想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400,346.
- [4]金岳霖.论道[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绪论4.
- [5]D F PEARS, B F MCGUINNESS. Ludwig Wittgenstein Tractatus Logico-Philosophicus[M]. London: Routledge & Fegan Paul Ltd, 1974:5.
- [6]王中江,安继民.金岳霖学术思想评传[M].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278.